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中国围棋史话

第一章 众说纷纭的围棋起源

尧舜以棋教子琴棋书画，中国古代四大艺术，源远流长。

琴棋书画之棋，指的就是围棋。

晋朝人张华在他写的《博物志》中说：“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。”还提到，舜觉得儿子商均不甚聪慧，也曾制作围棋教子。

《路史后记》写得更为详细。尧娶妻富宜氏，生下儿子朱，儿子行为不好，尧很难过，特地制作了围棋，“以闲其情。”（注一）

按照这种说法，制造围棋，是为了开发智慧，纯洁性情的。

不过也有另一种看法，认为“夏人乌曹作赌博围棋。”（注二）

唐朝人皮日休在其《原弈》一书中则说，围棋始于战国，是纵横家们的创造。他的根据是，围棋“有害诈争伪之道。”（注三）

这样一来，围棋又成了寻欢作乐，耍弄权术的工具了。

其实，这些说法都不过是推测而已，尧、舜之说只是编织的美妙传说。乌曹在《古史考》中被认为是造砖的先祖。在造围棋方面找不到更多的佐证。至于皮日休提出的围棋源于战国。更不足为信。早在春秋时，孔子就已经提到围棋了。

也是一种推测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，不少绘有黑色、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，线条均匀。纵横交错，格子齐整，形状很象现在的围棋盘，但纵横线条只有十至十二道，而不象现在是十九道。考古学家讽称之为棋盘纹图案。

湖南省湘阴县挖掘出一座唐代古墓，随葬品里有围棋盘一件，大小呈正方形，纵横各十五道。

在内蒙古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里，挖出围棋方桌，高十厘米，边长四十厘米，桌上画有长宽各三十厘米的围棋盘。棋盘纵横各十三道，布有黑子七十一枚，白子七十三枚，共一百四十四枚。另有黑子八枚，白子三枚空放着。想必墓主生前好弈，舍不下一盘残局，带到九泉之下琢磨去了。

这些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件古物，但足以说明几点：首先，不容置疑的是，围棋在原始社会时，已具雏形。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。

其次，从出土棋盘的十、十三、十五……直至今天通用的十九道线的发展过程看，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，而是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，棋子由少到多，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，时间跨越数千年，集聚了无数围棋爱好者的智慧和经验，逐渐被改进，被丰富，最后形成今天这种规模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围棋的创造者，是我国广大的劳动群众。

由于战事频繁，军事学知识渐渐积累起来。下围棋和军事上的运筹帷幄，调兵遣将有几分相似。战争的需要势必加速围棋的发展。两汉时已有人把围棋当作兵法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还有棋谱收入兵书。

围棋的故乡是中国

有了上面那些推断和考古学家的发现，围棋诞生于何处已不言自明，但是，日本松井明夫先生在其《围棋三百年史》的“发端”一篇中说：“围棋与象棋有它们的共同的祖先，就是中亚细亚的一种‘盘戏’。它流传于西方成为国际象棋，流传于东方而受到中国天文及其他科学的影响，改良成为十六道的围棋。”

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。

回顾历史，从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书中。很容易了解到，围棋在我国春秋、战国时期，已经广为流行，甚至出现了诸侯列国都知道的围棋高手。众所周知，那个时候，中国和西域各国还没有交往。直至西汉时方有张骞出使西域，中国才和中亚细亚诸国有了文化交流。而那时，围棋在中国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了。

从弈到围棋

现代人说弈，包括围棋、象棋、军棋等一切棋类。最早的时候，弈是专指围棋的。

东汉的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弈，围棋也。从廾、亦声。”廾的古文字为两人举手握棋对局的象形。

弈即围棋，还可以在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中发现，《孟子》中也提到过。

“围棋”一名也是发展而来的。西汉末杨雄在《方言》中说：“围棋谓之弈，自关而东，齐鲁之间皆谓之弈。”可见，西汉年间，弈已成了围棋的别称。仍然称弈的。只有北方部分地区。

到了东汉，围棋已在书面语中普遍使用，比如马融著的《围棋赋》，李尤写的《围棋铭》等。

围棋在发展演变过程中，除了“弈”和“围棋”，还有“许多有趣的名称。晋朝时，有人称围棋为“坐隐”和“手谈”。（注四）不过到最后，还是这概括了围棋着法的“围”字保存了下来。

（注一）《路史后记》

（注二）《潜确类书》

（注三）《原弈》

（注四）《续博物志·语林》《苑委余编博物志》

第二章 出现了围棋高手的春秋、战国时期

“鼻祖”弈秋围棋见于我国史籍最早的记载，是春秋时期，至今已有千六七百年的历史了。

弈秋是见于史籍记载的第一位棋手，而且是位“通国之善弈者”。关于他的记载，最早见于《孟子》。由此推测，弈秋可能是与孟子同时的人，也可能稍早一些，大约生活在战国初期。

弈秋是当时诸侯列国都知晓的国手，棋艺高超，《弈旦评》推崇他为国棋“鼻祖”。

由于弈秋棋术高明，当时就有很多年青人想拜他为师。弈秋收下了两个学生。一个学生诚心学艺，听先生讲课从不敢怠慢，十分专心。另一个学生大概只图弈秋的名气，虽拜在门下，并不下功夫。弈秋讲棋时，他心不在焉，探头探脑地朝窗外看，想着鸿鹄什么时候才能飞来。飞来了好张弓搭箭射两下试试。两个学生同在学棋，同拜一个师，前者学有所成，后者未能领悟棋艺。（注一）

学棋要专心，下棋也得如此，即使是弈秋这样的大师，偶然分心也不行。有一日，弈秋正在下棋，一位吹笙的人从旁边路过。悠悠的笙乐，飘飘忽忽的，如从云中撒下。

弈秋一时走了神，侧着身子倾心聆听。此时，正是棋下到决定胜负的时候，笙突然不响了，吹笙人探身向弈秋请教围棋之道，弈秋竟不知如何对答。不是弈秋不明围棋奥秘，而是他的注意力此刻不在棋上。（注二）

这两则小故事都记载在史书上。人们把它记下来，大概是想告诫后人，专心致志是下好围棋的先决条件。

出现弈秋这样的高手，说明当时围棋已相当普及，可以肯定，象弈秋这样的国手不只一人。弈秋是幸运的，春秋战国延续五百年，他是留下名字的唯一的一位棋手，也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棋手。

举棋不定不得胜围棋在春秋战国时代，不仅出现了许多下棋高手，而且引起诸子百家的注意。春秋战国正值我国奴隶社会解体、封建社会确立之时，诸子百家各执己见，到处游说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已经十分风行的围棋开始在诸子百家的言论中出现，或褒，或贬，或以围棋为例，或直接论述围棋。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论点，围棋的理论开始形成。这对围棋的发展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
士大夫阶层最初是瞧不起围棋的。孔夫子在《论语》里说，下围棋的都是些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的人，是成不了贤人达士的。（注三）

他把围棋看做无聊消遣的东西了。

他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，以后有人攻击围棋时，常说些类似的话。

孟子师承孔子，在这方面持同样见解。他曾说：“下围棋的人嗜好饮酒，甚至能够不顾父母养育之恩，不尽孝敬之义。”他把下围棋算作五不孝之一。（注四）

和孔子不同的是，他不认为下棋可以“无所用心”。《孟子》里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学习围棋如果不专心于自己立足的一方并致力于攻克对方，就不能领会围棋的精髓。”（注五）

这里，孟子不仅承认围棋是门深奥的艺术，必须专心致志才能学会，同时又指出这种奥秘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。当时提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义的。

以后，围棋的地位逐渐提高。《关尹子》里指出：“射箭，驾车，操琴，学棋，没有一件事是能够轻而易举学会的。”（注六）

显然，围棋这时已提高到与射箭，驾车、操琴同样的地位了。

围棋地位提高了，下棋的某些规律也慢慢被总结出来。《尹文子》一书中写道：“象围棋这样以智力取胜的游戏，进与退，取与舍，攻与守，纵与收，主动权都在我。”（注七）

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尹文子能够提出主动权问题是很难得的。主动权在围棋实战中作用重大。到今天，始终掌握棋局的主动权依然是每一个围棋爱好者必须牢记的。

“举棋不定”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，形容一个人犹豫不定，不能决断的状态。这个成语是和围棋联系在一起的。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，是《左传》上太叔文子的一段话：“下围棋而举棋不定，不能战胜对方。”（注八）

太叔文子总结出一条着棋的重要经验，这就是，思考要周密，落棋要果断，犹犹豫豫者必输。“举棋不定”四字，简洁，生动，形象而且准确，它和围棋一起流传下来，并超越了围棋本身，成为人们的常用语。

太叔文子的观点影响深远。汉代马融的《围棋赋》和应扬的《弈势》，明代张拟（一说张靖）的《棋经》，都论述和发挥了这一观点。

春秋战国时，出现这么精粹的围棋理论，出现如弈秋那样的“通国之善弈者”，这在围棋发展史上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，它标志着围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。

（注一）《孟子》

（注二）《新论·专学篇》

（注三）《论语》

（注四）《孟子》

（注五）《孟子》

（注六）《关尹子》

（注七）《尹文子》

（注八）《左传》

第三章 围棋大发展的两汉三国时期

“天下第一名手”汉朝时，围棋发展还较缓慢。目前见于史籍的棋手都是西汉时期的。

据说，西汉时人称杜陵人杜夫子为“天下第一名手。”他棋艺高强，好棋如命。有人讥笑他在下棋上乱花功夫浪费时间，谁知道他却回答说：“我精通了围棋之道，可以弥补孔夫子之不足。”一个封建大大夫，竟敢说这样的话，可见他确实是把围棋当作一种艺术，当作一门不在儒家经典之下的学问来研究的。而且，杜夫子看来还是位有胆气的汉子。（注一）

西汉时，以棋扬名的还有刘去和陈逐。传说，陈逐因陪汉宣帝下棋，讨得天子欢心，后来还得了太原太守的官职。（注二）

汉代宫中盛行围棋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，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。（注三）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八月四日下围棋成了汉宫中的风俗，晋人干宝在其《搜神记》中说，这天下棋，赢家可以终年有福，输家可能遭疾病之灾，要免除灾难，只能取一缕发丝，面朝北辰星，乞求它赐予长命百岁，给这一风俗涂上了神秘色彩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汉代朝野皆下围棋是有据可查的事实。（注四）

善诈的曹操也善弈围棋到了三国时，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局面，涌现出大批优秀棋手。

曹操是三国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计谋多端。据《三国志·太祖纪》记载，曹操的棋力也不弱。他与当时魏国的著名棋手山子道、王九真、郭凯都交过手，棋术即使不在其上，也堪称对手，旗鼓相当。

《三国志》中还提道，孔桂棋力也很强，他被推荐给曹操，曹操见他通晓围棋之道，很是喜爱。以后孔桂常伴在曹操左右，随从出入。

魏国还有一位大棋家，是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王粲。一次，王粲看人下棋，棋局乱了，王粲凭着记忆，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。下棋人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们用布把复盘的棋局盖起来，请王粲再重摆一遍。王粲胸有成竹，第二次摆出了打乱前的棋局。下棋者揭开罩布，两下一对，不错一子。（注五）

王粲因此为《弈旦评》誉为“弈中神人”。

围棋在魏国还掩饰了一个政治阴谋，一桩人命案子。此事也发生在曹氏门中。曹操的第三子曹彰骁勇善战，随军北伐时，曾独自率领百余人追赶敌寇，喜得曹操连声说：“我儿真是有用之材啊！”后曹丕当了皇帝，对刚勇的弟弟总存有戒心。为消除后患，一日，曹丕邀曹彰到卞太后宫中下围棋，边下棋边吃着枣儿，兄弟情义融融。其实，曹丕早已在一些枣儿里下了毒，自己拣好的吃，曹彰却识不出好坏。不多会，曹彰中毒。

卞太后见状惊恐万分，赶紧喊人弄一罐水来。但文帝已事先命人打碎了水罐。一时太后宫中乱作一团，太后不知如何保住爱子性命，赤足奔至井边，然而无法汲水，曹彰终于暴死在卞太后怀中，黑白分明的围棋盘沾上了一滴鲜红的血迹。

“一灯明暗复吴图”三国之中，蜀国下围棋的人相对少些，但也不无名

家。《三国志费祎传》中说，费祎很喜欢下围棋。后主延熙七年间，魏军大举侵犯蜀国，费祎率兵抵挡。当时，形势很紧张，敌人大兵压境，蜀军随时都有战败的可能。费祎却指挥若定，稳坐军帐之中，与光禄大夫来敏专心致志地下围棋很有大将风度。据说，在这战乱之秋，费祎常下围棋，劳逸结合，从不影响战事。

在吴国，围棋流行的程度不亚于魏国，甚至还出现“棋圣”、“弈圣”。

严子卿、马绥明是吴国最有名的棋手也就是被称为“棋圣”（注六）

、“弈圣”

（注七）

的人物。可以说在当时是天下无敌了。相比之下严子卿的棋力可能更强一些。

据《吴录》说，他名叫严武，当时棋手中没有他的对手，他和书法家皇象、画家戴不兴等人被人称为吴国“八绝”。

吴国上层人物中，好弈者甚多。孙策、吕范、诸葛瑾、陆逊等都是围棋好手。

《三国志吕范传》上讲了这么件事：吕范攻打山越回来，准备向孙策汇报战绩。孙策并不让吕范站着干讲，两人是一边下围棋一边谈论战事的。

诸葛瑾和陆逊这两位棋迷则一急一温，性情差异很大。据《三国志·陆逊传》记载，吴嘉禾五年时，孙权令陆逊和诸葛瑾率军攻打魏国的襄阳。因军情泄露，形势严峻。诸葛瑾有些紧张了，坐卧不安，更无心对弈。陆逊则不然，依旧不慌不忙地下棋。

围棋在吴国风行，最后竟使孙权的儿子孙和紧张起来。因为，他的幕僚如蔡颖一班人都喜欢围棋，常因下棋耽误公事。为此，孙和特地找来一个叫韦曜的文人，命他写了篇《博弈论》，批评这些下棋误事的人。文章说，当时的人大多不讲究孔孟之道，却喜欢围棋，荒废了事业，忘记了饮食休息。为在棋局上争一雄雌，搅尽脑汁，甚至可以夜以继日，弄得身心废瘁，事业放着不管，客人搁着不招待。虽有美味佳肴，优雅音乐，都无暇顾及。文章说，这不符合孙吴的治军之理，也不符合孔孟的为人之道。

围棋风行到这种程度，名手自然越来越多，精彩的对局也随之出现。以后，好的对局慢慢被人收集起来合成集子，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。在隋唐之前的敦煌本《棋经》中，曾两次提到“吴图二十四盘”，指的就是吴国流传下来的棋谱。在后代大诗人杜牧诗中，尚有“一灯明暗复吴图”的优美诗句，可见吴国棋谱影响之深远。

声东击西，应此攻彼前面已提到，汉、三国期间，社会贤达中喜欢围棋的不少，“高品”也不乏其人。

他们对围棋的造诣很深，加上他们的学识和社会地位，他们对围棋的论述，其深刻性、系统性、全面性和影响面，较之春秋、战国时期，有了很大的发展。这期间，还出现了一些有关围棋的专著。

东汉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班固，写有《弈旨》一文，其部分段落散于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古文苑》和《太平御览》之中，这是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围棋理论文章。班固对围棋作了细致、深刻的论述。他指出：一个好棋手要有雄才大略有“苏（秦）张（仪）之姿，固本自广”，方能使“敌人恐惧”。此外，要有全局观念，计划要周密，“有似夏禹治水之势”。否则，“一孔有阙（打破缺口）坏败不振。”在对局中，作者提出了声东击西，应此攻彼的

战术，提出“曹（刖）子之威，作伏设诈，实围横行”，“田单之奇，要厄相劫，割地取偿”。在自己棋势比较孤弱时，应取守势，这样，“既有过失，能量强弱，巡逻需行，保角依旁，却自补续，虽败不之。”班固的学生马融，写了一篇《围棋赋》，内容比《弈旨》更丰富，对棋艺的理解更加深刻，当时马融的名声已很大了，门徒千人。朝廷的要官马日磔、卢植，经学大师郑玄都是他的学生。他对围棋的见解，博得好评。

马融说，围棋的胜负策略，犹如头发那样细微；黑白双方的布局，则象麻那样错综复杂。他认为，攻守各有法则，守要坚固，攻则应前后呼应，上下联络，不能“唐突”。

否则敌军将深入自方，杀子占地，自己的棋子就会处于上下离异、四面隔绝，围包不住、梗咽不畅的状态之中，这就很危险了。

与马融同时的李尤，也著有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短文《围棋铭》，短短三十二个字，就使围棋对局跃然纸上，栩栩如生，铭中写道：“诗人幽忆，感物则思，忘之空闲，玩弄游意，局为宪矩，棋法阴阳。道为径纬，方错列张。”精通棋艺棋理的黄宪，曾撰有《机论》，专门论述围棋的虚实形势。他所说的“机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布局，那时黄宪已提出，布局要着重解决虚实问题，布局好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才能取胜。这一理论为我国围棋布局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。

“建安七子”中的应扬也写过围棋专著，他的《弈势》至今仍保存完好。文中论述的围棋临局争斗时的得失，很有见地。

汉魏三国时，也有一些反对围棋的议论。这些议论大都沿袭孔孟的偏见。西汉人贾谊说：“失礼迷风，围棋是也。”他觉得封建等级制和帝王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封建礼教是治邦安民之本。然而当时围棋风行，上至君王大臣、下至平民百姓，都被围棋迷住了，一下棋往往就忘了尊卑，失了“礼”。因而他认为围棋是迷乱风气之物，不足取。

还有一种看法，如西汉刘安在《淮南子》中提到，下围棋太浪费时间，如果用下棋的时间去读书求学问，“闻者必广矣。”由于围棋本身的魅力，只要下得适度，非但不浪费时间，而且能够启发智力，磨砺思维，加强人们彼此间的情感，那些反对的言论没有起到多大作用。

十九条线棋盘问世围棋的发展，一般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棋艺的提高，一是棋盘的改进，二者是相互关联的。棋艺提高了，就要求进一步改进棋盘，棋盘改进后，又对棋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围棋纵横十六道线的棋盘保持了相当长时间，汉魏三国时，围棋呈现出发展趋势，围棋高手，很可能不满足十六道棋盘。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十九道线，三百六十一路棋盘出现于何时，尚无定论。

《孙子算经》上有句话：“今有棋局方十九道，问用棋几何？答曰：三百六十一。”

术曰：置十九道，自相来之，即得。”问题是，《孙子算经》作于何时，历来看法有分歧。清朱彝尊认为是春秋时孙武所著。清阮元则认为是周朝时的著作。但因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未录，至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上才有记载，也有人就认为是两晋南北朝的著作。近人又考据论证，它可能是东汉时的作品——如果此推断不错，那就是说，东汉时围棋盘已是纵横十九道了。

东汉人马融、蔡洪在《围棋赋》中，有“棋锥”、“五岳”的提法，对这些布局加以分析，可以看出，只有十九道线，三百六十一路的棋盘才可能

形成。这再次说明这种棋盘是东汉时问世的。

但三国时魏国邯郸淳的《艺经》里写着，“棋局纵横各十六道，自黑棋各五十枚。”而且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的古墓中，人们发现初唐时彩色围棋仕女图，画的围棋盘是十六道。

与此相关联的是著名的《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》的真伪问题。这一棋局见于宋人李逸民编的《忘忧清乐集》，多少年来影响很大，但因为这局棋是在纵横十九道的棋盘上展开的，和三国时邯郸淳的记载相违，从清朝人钱大昕开始，对它的真实性发生了疑问，百余年来争论不休。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局棋。

我们认为，棋盘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尤其是这种变化要被所有的棋手认可，不可能在一时一处完成。新形式总是由局部到全面，逐渐推广完善的，而老形式也不可能一夜间在地球上完全消失。我们可以这么设想，纵横十九道围棋盘，最早出现于东汉，完成于隋唐，而纵横十六道围棋盘，到初唐时尚未完全消失，还在部分地区流行。如果这个设想得到证实，那么《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》的真伪就不难分辨了。

围棋盘由纵横十七道二百八十九路，改为纵横十九道三百六十一路，在围棋发展史上是一飞跃性的变化，从此以后的全部围棋史都将证明这个飞跃具有重大意义。

（注一）《西京杂记》

（注二）《前汉书·陈遵传》

（注三）《西京杂记》

（注四）《搜神记》

（注五）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

（注六）晋·葛洪《抱朴子》

（注七）《弈旦评》

第四章 围棋风靡一时的晋朝时期

还是下棋要紧

晋武帝的秘书丞张华棋术高明，常被皇上召去对弈。

次正下着棋时，老将军杜预给皇上送来奏请伐吴的表章。张华见此情况，马上站了起来，把下到一半的棋盘推开，侃侃而谈，劝说晋武帝伐吴武帝真还听了这位棋友的意见，决兴师伐吴。

这是下棋而不忘国事的故事。史书上还记载着不少西晋棋迷不顾家国荣辱，醉心围棋的事。

西晋著名的“竹林七贤”，喜好清谈，行为放荡，不拘礼制，他们也都很喜欢下围棋，阮籍是“七贤”之一，《晋书·阮籍传》上说阮籍母亲死的时候，他正在下棋。对手表示可以暂缓一下，待阮籍料理完老母后事再继续，阮籍不干，一定要马上决一胜负。（注一）

王戎也是“七贤”中的名士之一。据说，他小时候下围棋就已有了点名气，在任豫州刺史时，母亲死了，他和阮籍一样，不拘礼制，仍在家中看别人下棋。

还有比阮籍、王戎更痴心于围棋的，下棋下到了不计荣辱的地步。《晋书·裴遐传》就记载了这么件事。说的是裴遐在平东将军周馥家与人下棋，有人问裴遐敬酒。裴遐正专心于棋局，没有马上喝。这时那人已醉醺醺的，见裴遐竟敢不喝他敬的酒，勃然大怒，一把抓住裴遐，将他推倒在地。只见裴遐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神色没有丝毫变化，接着下他的棋。（注二）

本节开头说了晋武帝听了张华之言，放下围棋讨伐吴国的故事。讨伐胜利后，武帝又重操棋子，这回他可非下过瘾不行了。这次是与王武子对局，投降过来的吴主孙皓就站在一旁观看。下了一会儿，晋武帝忽然问孙皓，“你为什么喜欢拨人皮？”（吴国刑法严酷，“每凿人眼目，剥人面皮。”）孙皓回答：“对君主无礼的人就该剥皮。”王武子怒斥孙皓就是无礼的人，晋武帝却说，“还是下棋要紧。”性情各异的东晋棋手东晋会下棋的人很多，开国元勋丞相王导精通棋艺。他曾与长子王悦对弈，认为这里面有无穷乐趣。他的次子王恬多才多艺，其中围棋最好，是东晋初年最有名的棋手之一，与王恬齐名的，还有江霖，他也有多方面的才能。

围棋是陶冶人的性情的，下棋的布局、着法、时间、节奏，乃至对输赢的态度，很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情。我们从《晋书》中摘取几段东晋棋手的小故事，读者可以从这些小故事中看到东晋棋手迥然不同的性情和修养程度。

谢安是当时著名的围棋爱好者。符坚率军侵犯晋国，打到淮肥时，京师震动。晋帝当即提升谢安为征讨大都督。前方战局吃紧，谢安的侄子、将军谢玄前来请示退敌的办法。谢安面无惧色，不以为然，说是自有办法。让谢玄随他与亲友一道去山中别墅游玩。

到了山中，谢安摆开棋盘邀侄儿对局。谢玄原本棋高一筹，这时因为紧张，糊里糊涂败给了谢安。谢安很高兴，晚上回家后，开始指示如何对敌作战的方案。这一仗把入侵的符坚打得溃不成军。捷报传来，又碰上谢安在

下棋。谢安扫了一眼捷报。顺手放在床上，声色未动，继续下棋。客人们忍不住手纷纷问他仗打得怎么样。他这才缓缓他说：“仗打胜了。”谢安临危不乱，坚定沉着，风度令人叹服。

祖纳也是东晋时代的围棋好手。他的弟弟祖逖在北伐中因孤立无援而告失败，为这事他很悲伤，终日下棋。朋友王隐劝他爱惜时间，不要全部花费在下棋上，祖纳回答：“我是借围棋来使自己忘记忧愁。”王隐说：“你可以通过建树功勋或著书立说来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何必借围棋来忘记忧愁呢？”祖纳喃喃道：“你的话我同意，可我没有那种力量。”祖纳的隐忍、自知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谢弘微和朋友下棋时，友人西南角上的棋势不妙，有被吃掉的危险。友人未看出来，旁边一位观棋人忍不住冲口说了句：“西南风紧得很，恐怕有翻船的危险。”友人顿时醒悟了，挽回了危局。谢弘微是当时的名棋手，败在友人手里实在不甘心。他大发脾气，把棋盘棋子都扔在了地上。

此外，当时还有袁羌、颜延之、潘茂、卢循、王虞等目前有据可查的棋手。《高逸沙门传》上说卢循与谢安、王羲之，王坦之等棋界名流交往甚密。《山堂肆考》中，则讲了一段颇能反映出潘茂风趣、幽默性格的事。一天潘茂上山，遇见两位道士在下棋，潘茂在旁站着看了很久。一道士见他这样，问他是否喜欢下围棋，潘茂答道：“入龙蛇窟（即蛇洞），出似雁行。”道士听了，含笑表示同意这个说法。

史书上能记载这么些棋手的名字，甚至还能让后人了解到这些棋手的性格秉性，说明当时这些棋手就很受人关注，他们的事经常被人谈论。

（注一）《晋书·阮籍传》

（注二）《晋书·裴楷传》

第五章 名手辈出、百花争艳的南北朝时期

下棋能当官也难免一死南朝的一些皇帝都十分喜欢围棋，如宋武帝裕，文帝刘义隆，明帝刘彧、齐高帝萧道成，武帝萧绩、梁武帝萧衍，简文帝萧纲；陈武帝陈霸先，还有后主陈叔宝等，他们有的设置官署管理棋手和围棋活动；有的举行围棋等级赛（甚至自己也参加这种比赛，有的组织编辑棋谱（甚至自己就是撰写人）……所有这些作为，对南朝围棋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。

宋朝就有人因下围棋而得官的。据《宋书·羊玄保传》记载，羊玄保棋下得不错，“棋品第三”。宋武帝与他下棋时，与他打赌，如果他赢了，武帝给他个大官，史书上称之为“赌郡戏”。最后，羊玄保果然胜了，武帝亦不食言，真的给了他一个宣城太守的官。

皇帝究竟是皇帝，他对棋手并不总那么宽厚。诸胤是宋朝弈林强手。六岁时已身手不凡，长大后更是天下无敌，是当时最好的棋手。宋文帝时，他是天下五绝之一。可惜叔叔犯了罪，全家遭株连。何尚之上书皇帝，说诸胤棋艺高超，在前人之上。为使围棋不致失传，请求皇上赦免他。谁知皇帝无动于衷，仍将他杀了，一代棋宗陨落，棋手们异常痛惜。

还有棋手王域是被宋朝皇帝“赐死”的。他得罪了皇帝，一天皇帝派人送给他一瓶毒酒，一道令，“赐”他自尽。这时，王正在家中与一位客人下棋。他看完圣旨，面不改容，如没事一般继续下棋，直到打完劫，终了局，把棋子放回盒子里后，他才把圣旨给客人看，告诉客人皇帝要他死。然后，他把毒酒倒入杯中，对客人说：“这酒就不劝你喝了。”一仰脖子，喝光了杯中毒酒。（注一）

于是，和皇上下棋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。《南史·虞愿传》上讲，宋明帝刘彧喜爱围棋，但水平不怎么样。下棋时要在棋盘上“去格七八道”，即用小棋盘。可他偏要和当时最好的棋手王抗对局。王抗诚惶诚恐，除了让子之外，还不时地吹捧皇上：“皇帝飞棋，臣抗不能断。”宋明帝居然就信以为真了，自以为天下第一，对围棋更着迷了，还特别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专门的官署，叫做：“围棋州邑”。《南史·王湛传》中是这么记载的：“明帝好围棋，置围棋州邑，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，湛与太子右率沈勃，尚书水部郎庾珪之、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，朝请褚思庄、傅楚之为清定访问。”这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第一次为围棋手们设立的官署，客观上起了推动围棋发展的作用，从此以后，人们不但对围棋的看法有所改变，而且有更多的人把围棋当作一种学问和技艺加以研究。

女子下棋却扮成男儿样史书在写到齐朝棋手时，已能概括出他们的棋风特色了，比如王抗，他的棋力在当时属于第一品，冯元仲在《弈旦评》中评论他下棋的特色是“速思取势”。

褚思庄是在宋朝已经出名的棋手。《南齐书·肖惠基传》说他棋力属于第二品，从前面引录的《南史·王湛传》里可以得知，他在“围棋州邑”里还任过“清定访问”的官职。他与王抗不同，他下棋思考的时间比较长，但善于进攻。有一回齐高帝命褚思庄与王抗赛棋，两人早上开始下，到了晚上才下完一盘，观棋的高帝已经疲惫不堪了，便命王褚二人先休息，待五更时

再来决战，王抗得此命令后，一头倒在棋盘边，呼呼大睡。

褚思庄却坐在棋盘边没有合眼，整整思考了一夜。这盘棋谁胜谁负不得而知，史官记录这件事大概用意不在评论两人的棋力，但两人不同的棋风，倒是在这里活生生地反映出来。

顺便提一下，我国史书上记载的最早一份记谱复盘，便是褚思庄记下的。那是宋文帝时，著名棋手羊玄保在会稽任太守，文帝心血来潮，命思庄去会稽与玄保下棋。迢迢千里，褚思庄一路风尘，如此辛苦，回去后总要对皇帝有个交待，褚思庄下完棋后，就把棋谱给记下了。然后带回京都在文帝面前复盘，算是了结了这趟皇差。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的记谱复盘。

（注二）

齐朝时，棋风与王抗相近的还有夏赤松。《南齐书·肖惠基传》中说他的棋力也是二品，还说：“赤松思速，善于大行。”就是说，他思路敏捷，棋风迅猛。

齐高帝第五个儿子肖晔，着棋也很是勇猛，不肯让人。据说他从小喜爱围棋，没有棋盘，他用草棍摆成纵横网格，潜心研究。后来终于成了高手。一次在武帝面前与竟陵王肖子良对局，肖晔手下无情，把肖子良杀得惨败。事后有人对肖晔说：“你该让他一点才好。”肖晔答道：“我有生以来不曾做过虚伪的事。”（注三）

围棋如此兴盛，连闺阁里的女子，也对围棋发生了兴趣。齐朝东阳地方，有一个名叫娄逞的女子，知书识礼，有点文才。据《南齐书·谢朓传》中说，她粗略地懂点围棋。

可在当时，女子下棋没有对手。娄逞如同木兰一般，便女扮男装与达官贵人交往。此举足以说明这女子不是平庸之辈。果然，娄逞的才能被发现，她被任命为扬州议曹从事。

可惜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位从事大人是位乔装打扮的女子。宋明帝一道圣旨，将其遣送还乡。娄逞换上女装上路了，一路上叹息不已：“我虽有这样的本事，却依然要作老妇打扮，真是太可惜了。”封建社会男尊女卑，女子学棋十分不易，娄逞是勇敢的，她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女棋手。

围棋九品制梁武帝肖衍是个棋迷，据说他常常通宵下棋，能奉陪到底的不多，陈庆之是其中之一。《梁书·陈庆之传》记载他从小就跟随梁武帝，陪梁武帝通宵下棋不困。武帝很喜欢他。

到溉也是常陪武帝下通宵棋的棋手。《南史·到溉传》说他棋力为第六品，但记忆甚好。有一回到溉在武帝面前，和当时棋力上品的棋界名手朱异等人赛棋。赛完后到溉复盘，不错一子，因而得到梁武帝的特别赏识。

受到梁武帝青睐的棋手还有王瞻。武帝常称赞他有“三术”，即下棋、射箭和喝酒。

梁武帝不仅喜欢棋手，还主持棋事。他曾令大棋家柳惔和陆云公主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围棋大赛，规模宏大，轰动一时。比赛后，由柳陆二人主持给棋手们定品级。据《南史·柳惔传》上记载，当时能评上品级的棋手就有二百七十八人，可见参加的人很多，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一次全国性围棋比赛。

当时评定棋手有九个品级。这种棋品制，在三国时就已经出现了。《说郭》上曾引魏国邯郸淳的《艺经》，上有：“夫围棋之品有九：一曰入神，二曰坐照，三曰具体，四曰通幽，五曰用智，六曰小巧，七曰斗力，八曰若愚，

九曰守拙。九品之外，今不复云。”在《棋经十三篇》上，也有相同的记载，明人许仲治在《石室仙机》中作过这样的解释：一品入神，是指：“变化不测，而能先知，精义入神，不战而屈人之棋，无与之敌者，这算上上。二品坐照，是指：“入神饶半先，则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”，有“至虚善应”的本领。这算上中。三品具体，是指：“入神饶一先，临局之际，造形则悟，具入神之体而微者也”。这算上下。四品通幽，是指：“受高者两先，临局之际，见形阻能善应变，或战或否，意在通幽。这算中上。五品用智，是指：“受饶三子，未能通幽，战则用智以到其功”。这算中中。六品小巧，是指：“受饶四子，不务远图，好施小巧”，这算中下。七品斗力，是指：“受饶五子，动则必战，与敌相抗，不用其智而专斗力”。这算下上。至于下中和下下，《石室仙机》未作解释。但我们已可看出，这九品中品与品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。这种品级制，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棋手九段制奠定了基础。

梁朝之后的陈朝，棋事不及梁朝那么纷繁，可以查找到资料的下棋者，仅二人。一是司马申，他十四岁时已有棋名，后来梁州刺史阳子春曾请他下棋，名手朱异当时也在场，局中，司马申有不少巧思妙手，使得在旁观看的朱异都惊叹不已。

另一位叫陆琼。《陈韦·陆琼传》上说，陆琼八岁时便能观棋不忘，复盘一子不差。

京城人都称他为神童。

“局上有劫亦甚急”北朝的官吏爱好围棋者甚多，曾“独步当时”的是罗腾。他对围棋很有研究，深得妙处。在他之后出现的乐抄，棋艺提高很快，不久便与罗腾齐名。

范宁儿看来是当时颇有争议的一位棋手。《魏书》上说，高祖在位时，范宁儿已是有名的棋手，他曾与李彪奉命南下去见齐武帝肖赜。肖赜得知范宁儿棋力不弱，便把江南名手，棋力一品的王抗叫来，让他们两人比试一下。结果范宁儿得胜。对范宁儿的胜利，众说不一。《宛委余编博物志》说范宁儿一战而胜王抗，说明他的棋力早已达到一品了。王世贞在《弈问》中也承认范宁儿确实胜了王抗，但他认为：“抗重而宁微也，宁儿以有心待王抗，而抗以无心待宁儿”，所以范宁儿胜了。他还指出，这不过是一盘棋而已，究竟谁高谁低，尚不可定。这段公案现已无法澄清，看来两位棋手造诣都不低。

官吏们喜欢围棋常与公差相抵触，适可而止是棋者应循之规，不过这分寸似乎不容易把握。北朝时倒是有些把握得好的人。《北史·魏收传》上说，前军将军魏子建官运不佳，十年不曾升官。魏子建并不着急，闲暇时，便与吏部尚书李韶和李韶的弟弟李延下棋。当时，人们都以为他下棋入了迷，不再旁顾其他，其实谁也不知他的心。魏子建后来说：“围棋可以加深一个人的品德修养，况且我现在不受重用，没有什么事，下下围棋不碍事。”以后，魏子建被调到边境上打仗，这一去，竟有五年没动一粒棋子。

象魏子建这么做，实在是不容易的。爱下棋的人一坐下，常常再不肯撒手了。甄琛喜欢围棋可以通夜下棋不止。《北史·张烈传》记载，张僧皓喜欢围棋，不管碰上谁，都愿意与之对弈，以至被世人讥讽。更有甚者，能够褻渎公职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
《水经注·陈留志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。北朝开封令阮简深爱棋艺，精雕细刻，对棋艺的关心胜于他的职务。一次县里有人抢劫，县城一片混乱，

阮简手下人不知如何是好，慌慌忙忙来到阮简舍下。当时阮简正在与人对弈，大概是正下到关键之处，外面的动静一点没听见。县吏急忙向阮简报告道：“劫急。”阮简神态也很紧张，似乎也很着急，但他对官吏说：“局上有劫亦甚急。”碰上这么个糊涂官，老百姓当然是要倒霉了。

当然，也有“改邪归正”的，《隋书·皇甫绩传》记载，隋朝棋手皇甫绩是个孤儿，从小随外祖父。他很喜欢下围棋，常与几位表兄对弈，对学业不怎么用心，外祖父恨铁不成钢，狠狠打了外孙三十大板。从此，皇甫绩“精心好业”，“略涉经史”。

棋谱的出现前面我们提到“一灯明暗复吴图”的诗句，其实，在吴图之前尚有汉图。汉图可能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棋谱。到了晋朝，棋谱集得更多一些了，据《隋书·艺文志》载，司马伦、马朗曾合著《围棋势》二十九卷。

不过，棋谱的大量出现，在围棋发展史上成为一件具有影响力的大事，是在南北朝时期，这与围棋的盛行，当时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，以及纸的广泛应用等因素有关。

南北朝期间出现的“棋势”、“棋图”、“棋品”之类的专著不下二十种，其中“棋势”、“棋图”是对局的记录，“棋品”可能是对棋手的品评。

据史书记载，当时对棋谱的编写是很认真负责的，例如褚思庄与羊玄保对弈，“因制局图，还于帝（宋文帝）前复之”。梁武帝时，特邀三品棋手柳惔“品定棋谱”，著名棋手到溉则常与“朱异、韦黯于御坐校棋比势，复局不差一道。”这些编撰成集的棋谱无疑都是当时名棋手对局中的精华。这些棋局能汇集成册，便于流传和推广，对围棋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棋谱的产生，是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因为有了棋谱才有可能总结围棋的实战经验；才有依据去研究围棋的经验。

遗憾的是，这些宝贵的记录已全部失传了，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。

虽然如此，南北朝时众多的围棋谱对后来围棋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近期发现的敦煌写本《棋经》，也是南北朝时的一部重要围棋著作。

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，南北朝时的围棋理论，在东汉班固《弈旨》和《围棋赋》等书的基础上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全书共有七篇，是一本较完整的论著。

南北朝时围棋史上出现的大飞跃，是以往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，是以后几百年围棋发展史的新开端。

（注一）《南史·王域传》

（注二）《南齐书·肖惠基传》

（注三）《南史·齐高帝诸子传》

第六章 诗如潮涌、棋如星云的唐、五代时期

名棋手王积薪及其传世之作《十诀》唐代一共经历了二百九十余年在这个昌盛的时代，围棋有了空前的发展，展现出了一幅绚丽的图画。

唐朝统治者对围棋颇为重视，唐玄宗特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官职，叫“棋待诏”，官阶九品，与“画待诏”、“书待诏”同属于翰林院，所以又被统称为“翰林”。至此，围棋手开始成为国家高级文职人员，从而确定了围棋在我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。

唐代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，使围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更快的发展。因此，唐代棋手多如星云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王积薪。

王积薪是唐玄宗时的棋手。据《西阳杂俎》记载，开元年间，王积薪曾在丞相张说家住过一段时间，在那里和一行和尚下过棋。王积薪自知棋力不差，不久便去投考翰林。

果然一战告捷，成为“棋待诏”。以后他就常在宫中陪唐玄宗下棋。

王积薪性情豁达，不拘小节。在棋艺上则刻意求精，勤勉好业。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：王积薪成名后，从不以名家自居，每次外出游玩，身边总带着一个竹筒，里面放着棋子和纸画的棋盘。他常把竹筒系在马车的辕上，途中不管遇见谁，哪怕是平民百姓，只要会下棋，都要下马来对弈一盘。谁要赢了他，还可以享用他款待的一顿佳肴。（注一）

《集异记》上说，安史之乱时，王积薪随唐玄宗逃往四川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

到了一处地方，住房都被一些大官们占用了。王积薪没有栖身之地，却碰到了婆媳两位女棋手，夜间一起谈论围棋忘了困倦。“邓艾开蜀势”便是那天夜里学得的。那时，王积薪已近晚年。

王积薪在当时所以名震天下，不仅是因为他棋艺高超，而且由于他提出了一套围棋理论，根据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，总结出围棋《十诀》。这《十诀》为：

- 一、不得贪胜。
- 二、入界宜缓。
- 三、攻彼顾我。
- 四、弃子争先。
- 五、舍小就大。
- 六、逢危须弃。
- 七、慎勿轻速。
- 八、动须相应。
- 九、彼强自保。
- 十、势孤取和。

围棋复杂多变，而王积薪仅仅以这十条，四十字，极其简练、准确而又通俗地概括了围棋实战中的战略和战术；总结了全局和局部，进攻和防守中的一些重要原理。有了这十条，便可把握住围棋实战各个阶段的关键之处。

《十诀》的影响十分深远。宋、明、清的棋手，莫不以《十诀》为座右铭。他们在探讨围棋理论时，也都把《十诀》作为基本原理，在《十诀》

的基础上，不断发挥和提高。

《十诀》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中的瑰宝之一。

王积薪另有三本围棋专著已经失传。其中《金谷九局图》记录着唐玄宗开元年间，王积薪与棋手冯汪在太原尉陈九言家里下的九局棋。因陈九言家又称金谷园，所以题为《金谷九局图》。可惜棋谱已经失传，我们无从知晓九盘对局中，双方精妙的棋艺与风格。但从晚唐诗人韩描写《金谷九局图》的诗句：“眼病休看九局棋”中，我们仍可想象出九局棋的激烈厮杀情景。另外，我们目前还能够从幸存下来的王积薪习用式子——“一字解两征”（见宋代李逸民所著《忘忧清乐集》）中，看到名棋手棋艺水平之一斑。

传友谊扬国威的围棋高手除王积薪之外，唐代尚有不少一流棋手。在唐朝日益频繁的国事交往中，这些围棋高手起了不少积极作用，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声誉。

开元 25 年，即公元 738 年，新罗（朝鲜）国王兴光病逝。唐王派出左赞善大夫邢涛为特使，前往新罗参加吊祭活动。唐玄宗知道新罗和中国一样，是君子之国，礼义之邦，“其人多善弈棋”，便命当时我国围棋名手杨季鹰作为邢涛的副手，一同前往新罗。这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去朝鲜的第一位棋手，杨季鹰显然棋高一着，到那儿后没有人能战胜他，朝鲜人民钦佩他，送给中国使者许多贵重的礼品。（注二）

顾师言也是当时的著名棋手。《旧唐书·宣宗本记》上，曾记载了一件他与来访的日本王子对弈的事。《杜阳杂编》记载更详细：日本国王子来访唐朝，唐宣宗得知王子精通围棋，便把顾师言召进宫，命他和王子对局。王子很高兴，拿出了极为名贵的棋盘“揪玉局”和棋子“冷暖玉”，谨慎地摆下阵势。虽说是下棋，因为两人是代表着各自的国家，心情都很紧张，一时胜负难分。顾师言唯恐有负君命，有辱国威，每投一子，都要凝思良久，举棋时，手指已经汗滋滋的了。经过一番苦战，到三十三着时，顾师言终于把日本王子逼到了“瞪目缩臂，已伏不胜”的境地，从而大获全胜。这就是有名的“三十三着镇神头”。

此事是否真实，自明代王世贞起，就有疑问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顾师言毫无疑问是位杰出的棋手。唐宣宗时，曾以一只盖金花碗为奖品，举行过围棋比赛。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围棋奖杯赛了。在这次比赛中，顾师言力挫群雄，最后战胜一位叫阎景实的棋手，夺得冠军，可以相信，以顾师言的棋力，是足以振国威的。

棋品和人品下棋有助于修养身心，磨练思维。许多棋手以其深厚的涵养，敏捷的思路赢得人们的尊敬。

据说唐元和年间，有一位名叫郑注的医生多才多艺，精于棋道，敏悟过人，人们都很喜欢他（注三）。另一位善弈者卢藏用，也才华横溢，文章、书法、音乐都很好，在读书人中享有声誉（注四）。但也有为取胜不惜采用卑劣手段，棋品不甚高明，人品也不高尚的。

《玉泉子》中说，东都留守吕元应，常和门客们下棋。一回，正下着棋，送来了大量公文。要他立即处理。吕元应刚拿起笔来准备批复，下棋的门客迅速偷换了一子。他以为吕元应处理文件，一时不会注意棋局。然而，吕元应并未专心于公文，门客的小动作，他看得一清二楚，只是未动声色。门客胜了这盘棋，第二天，吕元应就请这位门客走了，谁也不知为什么，连那位门客自己也不明其中原由。临行时，吕元应照例送了许多东西，以礼相